

上 海

胜 利 的 十 年

(1976—1986)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组织编写
上海市统计局

上海胜利的十年

(1976—1986)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上海市统计局 组织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琪生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上海胜利的十年

(1976—1986)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组织编写
上海市统计局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兴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07,000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书号 3074·782 定价 0.74元

前 言

今年是我们党取得粉碎“四人帮”斗争伟大胜利的十周年。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动乱的结束，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回顾十年发展，纵观八年巨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果断地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的基础上，党中央制定了改革、搞活、开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领导亿万人民谱写着一部伟大的历史巨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题目下，改造振兴上海是它的一个组成篇章。上海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全面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经济形势、政治形势一年好于一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上海要充分发挥优势，在全国四化建设中发挥“重要基地”和“开路先

锋”的作用的指示，上海制定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城市。现在，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正在逐步深入，文化体制改革正在酝酿，实施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已经迈开前进的步伐。

统计是认识社会的有力武器，统计数字是反映客观事物数量方面的精确语言。本书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如实地记述了十年来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反映了十年来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各项成就，记载了十年来上海人民坚持改革、勇于探索、开拓前进的光辉业绩。

我们期望读者能通过十年的回顾与思考，从历史的跨度来进一步加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性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的一系列战略转变历史意义的理解，进一步增强在“七五”期间深入改革的信心，进一步激发起献身四化建设的热情。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上海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将团结奋斗，锐意进取，坚持改革，深入改革，一定会继续写出改造振兴上海的新篇章。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上海市统计局

一九八六年八月

目 录

前 言	1
改革开放 成效显著	1
工业生产 阔步前进	16
农村经济 全面高涨	29
交通邮电 迈开新步	41
投资建设 喜结硕果	48
建筑行业 展露新姿	61
城乡市场 繁荣活跃	70
对外经济 迅速扩大	83
文化事业 蓬勃发展	92
职工队伍 不断壮大	104
人民生活 明显改善	112
振兴上海 大有希望	125
上海十年统计资料(1976—1985)	129
编者后记	156

改革开放 成效显著

粉碎“四人帮”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中，上海人民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坚持改革，开拓前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整个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全国一样，上海的政治、经济形势也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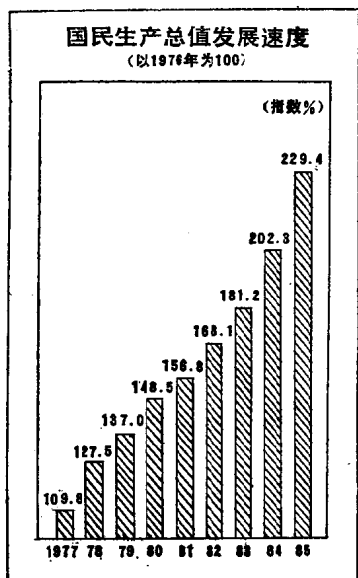
经济工作逐步转上以提高 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

通过调整经济和整顿企业，使经济工作逐步走上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坚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速度与效益、生产和消费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人民群众能够从生产的发展中取得更多的实际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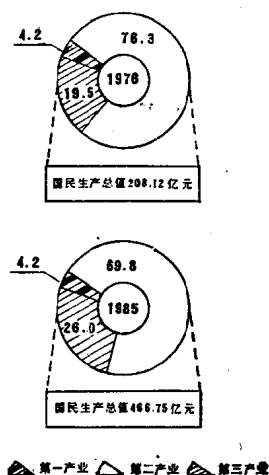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中，上海正常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冲击，经济发展时高时低，波动很大。以工农业生产为例，一九六七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4%，其余九年中，有三年增长率超过14%，有五年增长率在5—10%之间，一九七六年增长率只有2.2%。而且这种大起大落的动荡增长是在不讲质量、不计消耗的条件下实现的，造成经济损失极为严

重。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由于对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恶果估计不足，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加剧了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的失衡，国民经济被迫进行调整。一九七九年以后，贯彻调整方针，适当放慢了经济增长速度，逐步理顺经济关系，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在“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六五”初期的头两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为4—5%，一九八三年的增长率为6.5%，一九八四年的增长率提高到10%，一九八五年的增长率又提高到12.8%。一九八五年，上海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九十二亿七千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66%，平均每年增长7.5%。除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建筑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和各种服务行业都有较快的发展，被列为今后考核上海经济工作首要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九八五年达到四百六十六亿八千万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长80%，平均每年增长8.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由一九七八年的二千四百九十七元上升到一九八五年的三千八百五十五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六五”期间，在调整经济的同时，对全市四千多个全民所有制企业，五千多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分期分批进行了全面整顿，企业素质有了明显改善，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即每一就业者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徘徊在二千元至三千元之间，十年平均每年仅提高1.6%，其中有的年份还下降。而一九八〇年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已突破四千元，一九八四年突破五千元，一九八五年达到六千一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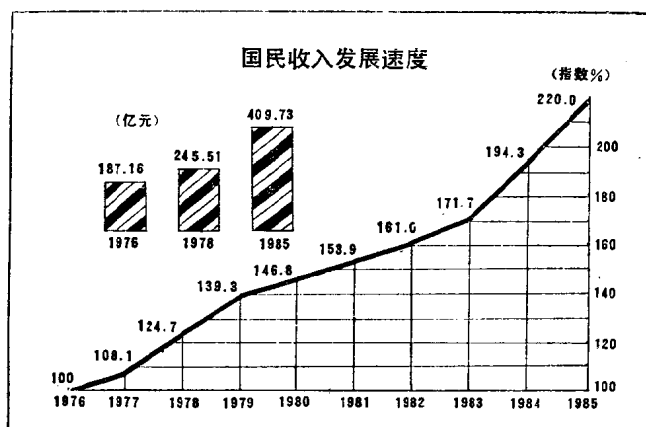


国民生产总值构成(%)



十三元,“六五”期间平均每年提高7.7%。生产中物化劳动的消耗也有所下降,“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社会产品物质消耗率(即物质消耗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61.3%,最高的年份曾达到64%，“六五”期间社会产品物质消耗率已降为60.9%。近年来,产品质量、资金利用效益、能源利用效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六五”期间,全市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5.8%,五年累计上缴国家财政收入一千零八十九亿元,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累计数的90%,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生产持续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的生活也有明显改善。一九八五年,全市居民人均年消费水平(包括集体福利)为九百六十一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一九



七八年增长 76.5%，平均每年增长 8.5%，大大高于前二十六年平均每年增长 2.3% 的速度，改变了长期以来高速度、低效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的状况。

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向协调

一九七九年以来，特别是在“六五”期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扭转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工业内部的轻、重工业比例关系，消费和积累之间的比例关系逐步趋向合理。

上海历史上曾是世界上第三产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之一，建国初期，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40% 以上。后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割断了上海与国际经济的密切联系，又

由于国内经济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削弱了上海同其他地区的横向经济联系，再加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片面强调要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过份强调工业生产，忽视了商业、饮食业、服务业、金融业和城市公用事业的相应发展，使第三产业相对萎缩，六十年代初期，第三产业比重下降到25%。“文化大革命”中，各项服务事业倍受摧残，第三产业比重继续下降到1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加快了第三产业发展，特别是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在研究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时确定“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工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方针以后，商业、饮食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旅游业、信息业、技术咨询业等第三产业发展更为迅速。“六五”期间，上海第三产业平均每年增长12.5%，快于同期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由于第三产业实现了超前增长，致使一九八五年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已上升到26%，大体恢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水平。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有利于增强中心城市的综合功能和对内对外的辐射能力，也有利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尽快转入良性循环。

上海郊区农村，由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初步调整，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与此同时，加快了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对市场需要的轻工业产品在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银行贷款、技术改造、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利用外汇和引进技术等六个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并调整了重工业内部结构，把为轻纺工业和农业技术改造服务作为重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上海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轻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7%，都快于同期重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5.5%的速度,改变了多年来重工业孤军突起,自我服务,挤农业、挤轻工业的不协调状况。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3.8%上升到一九八五年的6.8%,轻工业所占比重由47.5%上升到51.8%,重工业所占比重相应由48.7%下降到41.4%。在工业内部,近几年轻重工业发展也比较协调,比例基本稳定在56:44之间。

在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中,改变了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高积累、低消费状况。建国以来,上海每年生产的国民收入有一半以上提供全国使用,加上本市使用的积累基金,可供积累率(提供全国使用的国民收入与本市使用的积累基金之和占全市国民收入生产额的比重)一般在70%左右,“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可供积累率高达75%,本市消费基金只占国民收入的25%,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严重落后于生产发展。“六五”期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纠正了过去片面强调积累而忽视消费的做法,比较合理地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使可供积累率下降到69.7%,消费率上升到30.3%。在本市留用的积累基金使用方向上,加强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城市公用事业、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积累基金的比例,由一九八〇年的71:29调整到一九八五年的56:44,城市建设中“骨头”与“肉”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

经济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入

根据党中央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任务、步骤和基本方针政策,上海经济体制各项改革取得了显著进展。

上海的改革如同全国一样,首先在农村取得重大突破。一九七九年,上海郊区农村开始逐步推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打破了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目前已有99.3%的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并出现了四千四百五十六家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和一百六十个新经济联合体,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副产品商品率有了较大提高。同时,改革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完成了政社分设工作。一九八五年,又进行了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改革主要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改革,农村经济开始走上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轨道。农村改革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

上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一九七九年四月开始,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由点到面,逐步展开,从工业系统扩大到商业、建筑、交通等各个系统,计划、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劳动工资等各项改革都在向纵深发展。

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初步增强了企业的活力。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从扩大各类企业自主权入手,从单项改革到“小配套”改革,普遍建立各种形式的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使企业在生产安排、产品购销、资金使用、干部任免、机构设置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二百零七户国营小型工业企业试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的办法,仿照集体企业征收新八级累进税,免征调节税。在国营小型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企业,分别情况试行了由“国家所有、集体经营”,转为集体所有和租赁经营等多种方式。为合理划分权益,贯彻按劳分配,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的分配关系,先后实行了利润留成、利改税第一步和利改税第二步的改革。这几年,在工

业、建筑、交通、服务业等部分企业三十多万职工中，试行了各种形式的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办法。在企业整顿验收合格的基础上，有领导地进行厂长负责制试点，到一九八五年底止，全市已有六百七十四户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二百一十五户企业试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或“一长三师”(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的领导体制。这些改革措施，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

社会主义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市场机制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调节作用逐步增强。近年来，按照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管理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比重，除对少数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商品实行计划收购外，其余分别采取了订购、选购、自由成交等多种购销形式。物资系统按计划供应的品种已减少到二十七种，商业部指令性计划下达的日用工业品减到二十四种，实行指导性计划的九种，其余全部由市场调节。过去那种单渠道、多环节、封闭式的流通体制正在逐步向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方向转变。消费资料市场进一步畅通活跃，打破了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批发体制，实现站(一级站)司(市公司)合并，减少环节，经营更加灵活。全市商业系统还建立了十三个消费品贸易中心，四十九个交易市场和贸易货栈，四百零一个城乡农副产品贸易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逐步开放，全市已有十三个综合性或专业性的生产资料贸易中心，十多个县级物资市场和一批分布较广的门市部，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生产资料市场网络。近年来，还加强了资金的横向融通，扩大了银行信贷业务范围，发展了技术交易市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实现

生产力；开展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发展商品市场要求理顺价格体系，几年来，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对部分商品的价格进行了有升有降的结构性调整，实行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浮动价、协议价、自由价等多种价格形式，小商品和肉、禽、蛋等副食品价格已逐步放开。这对于促进生产、搞活流通、方便消费已显示出积极的作用。

逐步调整所有制结构，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为了适应现有生产力水平不平衡、多层次的结构，近几年，在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积极引导和适当发展个体经济，同时，还兴办了各种形式的合股经营联合企业，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一九八五年底，全市共有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三百八十三万三千人，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一百零六万人，各种联营、中外合营、外资经营企业职工三万二千人，城乡个体劳动者近十万人。在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比重由一九七八年的 92.2% 下降到一九八五年的 81.3%，集体所有制工业比重由 7.8% 上升到 16%，一九八五年还有其他经济类型的工业比重占 2.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比重从一九七八年的 85.4% 下降到一九八五年的 71.8%，集体商业比重由 14.3% 上升到 22%，个体商业比重由 0.3% 上升到 6.1%。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繁荣了城乡经济，方便了人民生活。

开始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和调节。随着对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僵化体制的改革，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逐步缩小，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和手段也发生了变化，将过去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转变为

注意综合运用计划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运行，价格、税收、信贷、补贴、奖励等经济办法的实行范围正在扩大。同时，加强了经济立法，陆续制定了一批新的法规、条例。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的原则，各级经济管理部门近年来在简政放权、机构改革和加强行业管理等方面也进行了探索，开始加强政策指导、统筹规划、协调平衡、服务监督等方面的职能。

对内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上海经济处在半封闭状态，对外经济联系只是单一的、规模比较狭小的进出口贸易，对内又因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锁阻碍着横向联系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经济由半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对内对外开放取得了重大进展。

开展不同层次、不同内容、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横向经济联系，是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七九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发挥地区优势，促进经济联合”以后，上海与内地的技术经济协作和联合不断深入发展，联合的领域也不断有所拓宽。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浙江省的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嘉兴市、湖州市，以及十个市所属的五十五个县。要求打破地区分割，部门分割，使这一地区的各种生产要素在新的协作和联合条件下重新组合，发挥区域经济的综合优势和整体效应，逐步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走向共同繁荣。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国务

院又决定把上海经济区范围扩大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一市。上海经济区建立后,按照经济联合、利益均沾、共同发展的原则,区域内生产、流通、建设、科研等各种横向联系不断深化,出现了一大批各种形式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形成了一些专业化、协作化、配套化的企业群体,并先后成立了二十七个全区性的行业联席会议和近三十个跨省市的联合公司和行业协会。在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组织和协调下,先后着手编制了经济区集资办电、集资办煤规划,四港联合规划,沪宁杭高速公路规划,电子工业南方基地规划,长江口、黄浦江和太湖流域的综合治理规划,以及上海经济区发展战略纲要(草案)等。上海与内地的联合,还同时在长江流域以至全国各地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经过几年的实践,上海的内联工作,已经由过去单纯的物资串换转向联合开发资源;由简单的生产加工协作转向专业化协作、系列化配套联合生产;由短期的、临时的经济技术协作转向长期的、比较稳定的协作;由单项的技术交流、合作攻关转向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科技成果转让和技术的系统开发。到一九八五年底,上海已与全国二十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合资经营、联合生产、补偿贸易、产销联合、科研生产联合等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二千多个,达成的技术协作项目四千零九十七项;开展有关生产技术、工程承包、环境保护、进出口规划、信息情况等各种技术咨询服务一万五千多人次;培训各项专业人才六万多人次,联合开发资源四百多项。同时还欢迎兄弟省市来上海开厂设店,全国已有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在上海办厂四十六家,开店六百三十三家。一九八六年三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上海又制定了一